

五千年前的智慧:仰韶村遗址的选址与布局

上官建宗 李爱民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北部,是仰韶文化的命名地和核心遗址,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该遗址地处豫西丘陵地带,北依韶山,南望涧水,东有饮牛河、西有西沟河,是一块北高南低、呈缓坡阶梯地势的台地,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2米至4米。从生态空间的视角来看,仰韶村遗址的选址与布局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和巧妙利用,呈现出功能分区明确、空间组织有序、生态适配合理的聚落特征,体现了先民择居建址的卓越智慧。

地形地势:北高南低的阶梯格局与功能分区

仰韶村遗址背靠韶山余脉,山体从北部蜿蜒而来,如屏障横亘,起伏和缓,呈阶梯状分布。从建筑空间看,北高南低的地势符合我国北方地区先民居住选址的基本朝向原则:北方地势高亢,可阻挡冬季干冷的北风,形成天然的御寒屏障;南方地势开阔低平,便于接纳充足的阳光和温暖湿润的东南风。

遗址由北向南层层递降的空间层次,具有显著的实用价值:由高向低,便于排水,可避水患;无论半地穴式还是地面房屋,居住环境安全干燥;中间台地坡度适中,土层深厚,是种植粟黍等旱作物的理想农田;低处台地临近水源,便于灌溉,可种植蔬菜等需水作物,也可作为饲养家畜饮水和生活用水的场所,形成了立体的功能分区,实现了居住、种植、畜牧的空间分离,提高了阳光、土地、水等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遗址的西侧原来有一土桥跨过西沟通向遗址外,为遗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路通道,既保证了聚落的相对封闭和安全,又避免了完全隔绝带来的不便。从建筑空间看,单一的通道便于设防和管理;从生产生活角度看,土桥也是物资运输和人员往来的必经之路,是维持聚落生计的重要生命线。

水文条件:两水交汇的聚落边界与生计保障

水是聚落选址中的核心要素。仰韶村遗址的水文条件较为优越:从生活需求来看,东西两沟常年有水,在遗址南部交汇。饮水方面,先民直接从沟谷中汲取生活用水,可供鱼类和其他水生资源的生长,丰富了先民的食物来源。从生产需求来看,先民可以利用简单的引水沟或用陶罐取水,用于农业生产或手工业用水。家畜饲养方面,沟谷之水为圈养和放养的家畜提供了便利的水源。两水交汇形成的天然屏障,还具有重要的防御功能。东西两沟如天然的护城河,阻挡了来自侧翼的侵袭,体现了先民在选址时的安全考量。

方位朝向:面南背北的向阳格局

“面南背北”是对光热资源的优化利用。我国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太阳常年偏南运行,南面是获取日照的最佳方位。遗址背靠韶山,面向南方开阔地带,冬季可充分接纳阳光,提高室内温度,房屋的南开门设计使阳

光可以直射室内,驱散寒意;夏季南风通畅,带走暑热,形成良好的小气候环境。充足的日照不仅有利于居住舒适,也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南向的坡地和台地因此成为农田的首选,长时间日照能够延长作物的有效生长期。

“面南背北”还便于先民观察天象、掌握农时。根据该遗址出土的月牙纹彩陶罐上的纹饰,可以发现仰韶先民已具备了初步的天文知识。通过观察天象的运行轨迹来确定季节变化,安排播种、收割等农事活动。南向的居住和公共空间,使先民能够清晰地观测日出日落的位置,判断四季变化。

六大功能区的分布与建筑设置

从仰韶村遗址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来看,建筑空间环境可满足仰韶先民“住、食、工、娱、厕、葬”等多种功能的需求。

住。仰韶村遗址发掘出土的房屋遗迹都位于遗址南部的向阳地带。第四次发掘在此区域发现的房址、窖穴、灰坑等遗迹和疑似为“混凝土块”的建筑遗迹,其中包含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屋。居址选择南部台地,充分利用南向日照,冬季背风保暖,夏季通风凉爽。大型房屋位于居住区中心,应为氏族公共建筑或首领居所,中小型房屋围绕其分布,形成向心性布局。围壕边界界定聚落范围,兼具防御与排水功能。

食。储粮的窖穴分布于居住区周边,与房屋相伴而生。储粮设施紧邻居址,便于日常取食,减少运输成本。圆形袋状窖穴形制规整,深埋地下,利用黄土层的恒温特性储存粟、黍等粮食,兼具防盗与防潮功能。

工。制陶作坊位于遗址东部或靠近水源处。制陶需大量用水,靠近东沟饮牛河,制泥、淘洗、冷却均依赖水源。陶窑生火产生高温与烟尘,布置于居住区下风向,避免火患与烟气侵扰。制陶区与居址保持适当距离,兼顾防火安全与生产便利。

娱。公共活动与祭祀空间以大型房屋为核心。大型房屋居于聚落几何中心,便于各户到达,体现公共空间的可达性;面积远超普通房屋,疑似“混凝土块”是一种较高规格的建筑遗物,与其他只有十几平方米或几十平方米的建筑形成反差,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层;灰坑中埋置人骨或兽骨,可能与祭祀活动相关,位于聚落核心。

厕。排污的灰沟、冲积沟等遗迹顺地势由北向南,形成天然排水系统。排污沟渠布置于聚落边缘或特定通道,避免污染饮用水源。部分灰坑可能兼具垃圾堆放与临时厕所功能,选址于居住区边缘,减少对居住环境的污染。

葬。遗址发掘出土的成人墓葬区位于遗址北部或外围高处,地势高于居住区,干燥避水,与居址分离避免干扰日常生活空间。从第一次发掘和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墓葬来看,墓葬头向都是向南偏西,主持第二次发掘的夏鼐先生分析可能与当地的埋葬习俗有关;头向南偏西,正对遗址南方的熊耳山;脚部向北,正对北方的韶山,是这个地区的一种埋葬习俗。儿童瓮棺葬分布于房屋近旁,体现“近家而葬”的空间观念,夭折儿童不入公共墓地,归葬于家庭空间范围内,反映一定的怜幼习俗。灰坑葬为非正常

死亡者的隔离性处理,空间上远离正常墓葬区与居住区。

屏障护卫:“四象”俱全的聚落格局与安全防护

“四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种指代,最常见的解释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形象,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从建筑环境学角度分析,仰韶村遗址的地理环境构成了四象俱全的格局,为聚落的安全防御和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方位保障。北部的韶山余脉,山体绵延起伏,如屏障横亘,阻挡了冬季北风的侵袭,使聚落内部保持相对温和的小气候。韶山还提供了丰富的森林资源,先民可获取木材、薪柴、猎物 and 野生植物,是聚落生存的重要资源库。南方面向涧水及开阔地带,增加了聚落的明亮度,也拓展了视觉空间。东部的饮牛河水系,沟谷中的植被茂盛,为先民提供了采集资源和放牧场所。西部的西沟和土桥通道,是仰韶先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四象”俱全的格局,使仰韶村聚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内外联通的生态系统。外部的阳光、风、水、气在此汇聚和调节,内部的居住、生产、祭祀等活动在此有序展开。

生产与生活:适配的建筑空间格局和实用功能

仰韶村遗址的空间格局与先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深度适配。居住方面,房屋的选址充分利用了阶梯地形,房屋多建于中高处台地,门向朝南或东南,便于采光和避风,形成了舒适宜居的微环境。农业方面,不同高度的台地实现了作物的分区种植,高处台地种植耐旱的粟和黍,低处台地种植蔬菜等需水作物,南向坡地光照充足,是主要的农田区。畜牧方面,猪的圈养设施多建于居住区附近,便于投喂和管理,家畜的放养则在沟谷和坡地进行。手工业方面,制陶区多设于聚落边缘或低洼处,远离居住区以减少烟尘和火灾风险,又靠近水源以便制泥和清洗。

人文象征与生态智慧

仰韶村遗址的空间格局,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客观呈现,更是先民主观选择和长期调适的结果。从聚落布局看,仰韶文化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门向朝南,围绕中心的大型建筑呈向心式分布,如同众星拱月,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墓葬区的设置也体现了空间观念,仰韶文化的墓葬多位于居住区附近,形成“生死相依”的空间格局,象征着生者与死者的持续联系。

综上,仰韶村遗址的建筑空间格局,是自然环境与人文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仰韶先民在选址建址过程中积累的地理知识和环境经验,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源头,也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理念的早期体现。今天,当我们站在仰韶村遗址上,环顾四周,仍能感受到先民选择此地时的那份审慎与智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

(作者单位:仰韶文化博物馆)

党家村古建筑群“福禄寿喜”照墙述略

樊军龙

党家村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泌水河谷北侧,背塬面水,村落呈葫芦形布局。元至顺二年(1331),党氏先祖党恕轩由朝邑迁此定居,初名“东阳湾”,后称党家村。2001年,党家村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入选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作为山陕古民居的杰出代表,党家村以保存完整的明清四合院群落著称,现存明清四合院123座。村内木雕、砖雕、石雕“三雕”艺术比比皆是,照壁、门楼碾头、屋脊、门墩石等处皆有精美雕刻,其中设于四合院门内的砖雕照壁(当地亦称照墙)以福、禄、寿、喜为主题의吉祥图像最具代表性。

照墙亦称照壁、影壁、萧墙,是中国传统四合院中大门内侧正对门处的屏蔽性墙体。其源可溯至西周礼制,据《论语·八佾》所载“邦君树塞门”,彼时惟天子、诸侯及采邑领主之官室宅邸方可设之,为身份与地位的等级标志;至明清时期,普通民居亦得设之,遂广见于北方宅院。照墙兼具遮蔽视线、聚气藏风之效。党家村古建筑群因空间所限,各家各户栋宇相连,照墙多借门前邻家之墙设置,多数是以砖雕吉祥图案为主的浮雕画壁,本文所论“福禄寿喜”即属此类;也有素壁照墙,壁面方砖白缝,寓意“清白方正”。这组“福禄寿喜”照墙叙事完整、保存完好,是研究明清北方民居建筑装饰与吉祥观念的珍贵实物遗存。

文物本体研究

照墙整体形制 该照墙设于大门外,正对门户,距门不足一丈,是置于邻家青砖墙面的浮雕画壁。主体画面以方砖铺砌为底,四周砌出边框,框芯表面浮雕吉祥图案,构图饱满,层次分明,整体风格质朴内敛,与党家村民居“朴实精美”的总体格调相契合。

全壁以青砖为材,采用浮雕为主、局部透雕为辅的工艺,砖面经岁月侵蚀呈青灰色调,浮雕凸起处棱角尚存,细部纹样清晰可辨,保存较好。

画面空间布局 壁身画面由四组图像构成完整叙事,空间排布遵循严格的方位逻辑:上方两角各雕蝙蝠一只,寓意“福”,右侧苍松参天为画面框架;中部为鹿衔灵芝、背倚青山之“禄寿”图,两侧分置“封侯”图与“双喜”图。四组图像以“上福、中禄寿、侧封侯与双喜”的格局铺陈,暗含由个人功名仕途(封侯)到物质财富(禄)、生命健康(寿)、人间欢庆(喜),终达精神与命运终极圆满(福)的递进层次。

逐项图像细读 其一,鹿衔灵芝、背倚青山,寓“禄”与“寿”双全。画面雕一梅花鹿,作回首衔芝之态,鹿首回望、口衔灵芝,四肢或立或行,姿态传神。鹿谐“禄”音,民间遂以鹿象征禄寿、财富与功名。鹿口所衔灵芝,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为传说中的长生不老之药,象征长寿延年。鹿背倚山形纹样,暗合“寿比南山”之典。三元素组合自有其逻辑:先有“禄”之物质基础,方能求“寿”之生命延续,终达“寿比南山”之永恒境界,体现了古人由物质而精神、由现实而理想的务实人生观念。

其二,蜂飞猴攀、背负官印,寓“封侯”进阶。画面树枝



上是一蜂窝,数蜂飞绕其间,下方一猴背负官印、攀援而上,作欲取蜂窝之态,蜂上猴下、上下呼应。蜂谐“封”、猴谐“侯”,猴身所负官印取“封侯挂印”之意,三者合而寓“封侯”之愿,象征官爵之获、步步高升、仕途通达。猴之造型在民俗谱系中衍生出“马上封侯”“辈辈封侯”等系列变体。工艺上蜂窝之镂空、蜂翼之薄透、猴身之毛发及官印之轮廓皆以浮雕与透雕结合表现,层次丰富,细节精微。

其三,双鹤翔集,寓“双喜临门”。画面雕两只喜鹊,一只展翅飞翔于空,一只立于松枝、展翅欲飞,双双呼应,构成“双喜”意象。“鹳”以双“喜”并置成字,暗合《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生成观念,将对称复叠的形式美学转化为吉祥寓意的视觉符号。金榜题名标志个体科举功名的实现,洞房花烛标志宗族血脉的延续,前者为个人社会价值的确认,后者为家族生命序列的接续,二者并举,实乃儒家“修身齐家”伦理理想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双重圆满。由此“双喜”由个别事件的纪念符号泛化为民间对人生圆满的普遍祈愿,婚庆以“鹳”字装点门楣之俗绵延至今。

其四,双蝠凌空、苍松为屏,寓“福”临宅院。画面上方两角各雕蝙蝠一只,蝠翼舒展、翩然欲飞,取“蝠”通“福”之谐音,寓意福气自天而降、笼罩宅院;画面右侧雕苍劲挺拔之松树一株,树干居右、枝干舒展、枝叶繁茂,为画面提供空间框架与背景支撑,与双蝠上下呼应。画面下方浮雕形状各异之石块若干,或方或圆、错落堆叠。据村中耆老相传,此即金银块之象形,隐喻“金银满堂”之富足;石块之间复生各类仙草,灵芝之属皆为祥瑞象征,寓延年益寿之祈;又见硕大莲蓬一枚,莲房饱满、籽实累累,谐诸“连”音,蓬籽繁密暗合“多子”之愿,与民间“连生贵子”之说相合。金、草、莲三组意象自下而上铺陈,与上方双蝠、右侧苍松相呼应,财富、寿考、子嗣诸般福泽毕集,“福”之内涵遂由蝠之谐音本义,扩展为财寿子嗣兼备之圆满体系。

综观四组图像,其共同特征在于以音取义、以图寓意,将具象的动植物纹样与抽象的伦理祈愿相勾连,形

成一套自洽的吉祥符号系统。在建筑装饰中,直白的文字训诫易显生硬,而富有深意的图案能潜移默化地传递价值观念,党家村这组照墙体现了一种“求全”的吉祥宇宙观。

工艺技术分析

该照墙砖雕的制作遵循传统砖雕工艺的完整工序,大致可分为制坯、阴干、雕琢、拼装四道环节。制坯阶段,工匠选取黏性适中、含砂量较低的黄土,经淘洗、澄浆、踩炼等工序去除杂质,制成质地细密的泥坯,再以木模或手工塑形,压制成规格统一的青砖坯体。坯体成型后置于阴凉通风处阴干,历时月余,使水分缓慢蒸发,避免因干燥过快而产生裂纹,这一环节直接关系到砖体强度与雕琢成败。待坯体干透,工匠方以凿、铲、刀等工具于砖面施以雕琢,依据画面稿样,先以剔地起突之法铲去地子、凸出主体,再以浮雕、透雕等技法细刻纹样,浮雕使图像凸起于砖面、层次分明,透雕则镂空局部、玲珑剔透,二者结合使画面兼具立体感与通透感。雕琢完成后,各砖块依序拼装于壁身,严丝合缝、浑然一体。

就材质而言,青砖以黏土烧制而成,质地致密、色泽青灰,兼具强度与耐候性,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而棱角尚存,浮雕凸起处细部纹样仍清晰可辨,足见其材质优良与工艺精到。因长期暴露于室外,个别浮雕凸起处棱角略有磨损,此为自然老化之正常现象,整体保存状况仍属良好。党家村砖雕与关中、晋南民居砖雕工艺一脉相承,同属北方砖雕体系,其剔地起突、浮雕透雕之技法,与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之砖雕多有相通之处;然党家村砖雕于质朴中见精工,题材以吉祥寓意与家训格言为主,更具民间性与教化性,体现了关中小民居砖雕独特的地域风貌。

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阐释

“福禄寿喜”四组图像,是中国传统吉祥观念的完整表达,也是家族伦理的物化载体。福、禄、寿、喜四字分别对应人生的精神圆满、物质财富、生命健康与人间欢庆,四者俱全、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古人对人生全方位圆满的追求。此种“求全”思维根植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价值取向。

就今天的保护实践而言,这组照墙的价值在于它把抽象的吉祥观念留在了可触摸的砖石之上:当我们在修缮中辨认每一处凿音、复原每一道刀痕,其实是在为后人保存一套仍在运转的民间意义系统。文物保护不只是留住建筑躯壳,更要留住附着其上的文化编码与家族记忆。

这组照墙砖雕将谐音取义、以图寓意的符号编码与“耕读传家、商文并重”的家族精神熔铸于青砖之上。它既是建筑装饰构件,又是民间信仰与伦理教化的图像文本,其形制结构、图像布局与工艺技法,为理解明清北方民居的建筑装饰、民俗文化与社会观念提供了一份具体可感的样本,也实证了党家村的文化价值。

(作者单位:韩城市党家村景区管理处)



济宁市博物馆将馆藏汉代画像石经车马出行图以拓片形式制成文创卷轴,生动再现了汉代贵族车马出行的宏大场面与礼制风貌。



济宁市博物馆拼图盖章卡套盒内含九张特种材质明信片,正面拼图可组合成一幅超大海报,背面九枚印章图案均取自馆藏精品文物,让观众在集章打卡的互动中完成一件独特的济宁文化记忆手作。



济宁市博物馆以馆藏文物元青花缠枝瓜果纹玉壶春瓶为原型,推出镂空书签,将文物凝练于方寸书页之间,让读者在翻阅中感受中国传统纹饰之美。



“你好,济宁”AR数字明信片以济宁古八景为创作主题,通过手机扫描即可让飞檐斗拱在水墨间舒展、运河帆影随光影流转,以数字科技让湮没于历史中的千年古景重焕生机。

随着数字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文物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济宁市博物馆拥有春秋列鼎、元青花、汉画像石、汉碑等大批珍贵馆藏,在文化转化实践中也真切感受到行业共性矛盾:文物数字化保护是不可再生实体文物规避损耗风险、实现长久保存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建立永久性数字档案,能够减少文物实体展出、调取频次,从源头降低实体文物损伤概率。但在现阶段实践中,部分项目存在活化传播、轻本体保护的倾向,数字化建设标准不统一、档案共享困难,活化开发时常对文物文化真实性带来潜在风险,保护与活化尚未形成以保护为本的有效联动。本文深入剖析二者内在逻辑,结合济宁市博物馆文化转化实践剖析协同现实困境,提出构建价值共识、数字资源管控、全链条协同、多元制度保障四个维度协同运行机制,为新时代文物资源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思路。

核心概念与协同的内在逻辑

从活态传承视角审视,文物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具备协同基础,但二者存在主次关系。从济宁市博物馆馆藏“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等石刻文物实践来看:一是价值目标同源共生,保护是根本前提。数字化保护守住文物真实的文化根脉,活化利用解决“如何向社会传播”的问题,二者最终目标都是实现文物文脉永续传承。二是资源要素双向互嵌,保护档案是活化的源头。文物数字化保护产出权威完整的原始档案素材,为包括文创在内的各类活化实践提供考证依据;在济宁市博物馆文创研发、向社会公众解读石刻文物的过程中,相关调研研究结论可以反向补充完善数字档案库,服务石刻文物保护研究。三是价值单向赋能为主,经济反哺仅作补充。数字化保护成果为各类活化实践赋予严谨的文化内核;活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在合规前提下补充用于文物保护工作。四是受众导向具备统一性,公共普惠为落脚点。活态传承强调社会公众的文化权益,文物数字资源面向科研与社会开放,活化成果走入大众生活,共同搭建公众认知文物的渠道。

当前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协同的现实困境

价值认知存在偏差,文物文化真实性面临失衡风险。文博机构开展文物数字化保护,首要准则是忠于文物本体,追求采集信息完整、考据严谨。活化与文创开发面向社会传播,容易受到审美偏好、社会热度的影响。济宁市博物馆数字化与文创开发过程中,部分数字化项目立项阶段,受活化开发诉求干扰,为适配后续文创设计需求,简化了文物完整信息采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保守倾向:只完成数字化存档,对风化严重的汉碑等珍贵文物数字资源紧闭开放通道,难以实现活态传承。两种情况都背离了文物活态传承的核心初衷。

数字资源建设质量参差不齐,资源壁垒与授权机制不完善。经过多年建设,国内博物馆积累了大量文物数字资源,济宁市博物馆同样留存多批次汉碑、画像石数字资料,但保护层面短板较为突出:不同时期数字化采集执行标准不统一,元数据记录详略不一,部分早期项目重扫描建模、轻文物考据,数字档案只记录外观图像,缺失石刻风化病害、修复记录等保护类关键信息;与曲阜周边文博机构跨馆数字资源整合共享难度大。文物数字成果的知识产权与授权边界模糊同样是现实痛点。这不仅制约文创开发,更阻碍文博单位之间基于数字档案开展石刻比对、病害研究等保护工作。

全链条衔接存在断裂,保护到活化缺少约束与反馈通道。完整的活态传承链条主线应当为:文物本体防护—文物数字化采集建档—数字档案长期运维—多元活化利用—信息反馈回流文物保护。对照济宁市博物馆的文创研发实际,文物保护技术团队和从事活化开发的市场主体之间,缺少专业化中介载体。既通晓石刻文物保护考据,又能够完成专业信息通俗转译的复合型中介机构供给不足。数字化保护、活化开发的决策多由文博机构和企业主导,缺少常态化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市场端的创意与解读很难回流至文物保护端,用于完善汉画像石数字保护档案。

专业人才供给不足,考核制度导向仍有局限。文物数字化保护本身就存在显著人才缺口:既掌握考古、文物保护知识,又精通三维采集、数字档案长期存储、数据灾备运维的保护技术人才较为稀缺。对济宁市博物馆而言,兼顾汉碑石刻考据、数字技术、社会传播思维的交叉人才缺口更为明显。考核激励机制同样存在短板。文博单位绩效考核多侧重数字化项目完成数量,对数字档案质量、档案服务文物本体保护的实际成效、数字资源安全运维权重偏低;市场主体开展活化项目的考核以传播、营收指标为主,对文物文化真实性的硬性约束不足。

徐珊 王宪

济宁市博物馆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实践

(下转8版)